

十九世纪英国汉学中的汉语与汉字特征述论

——《中国语言和文学讲义》(1853)

詹姆斯·萨默斯 著 于海阔 方环海 译

(伦敦大学 国王学院 英国 伦敦 WC2R 2LS) (厦门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 中国 厦门 361005)

编者按: 1853年4月,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①汉语教授萨默斯出版了他的首部中文研究著作《中国语言和文学讲义》(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②。这原是萨默斯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发表的一篇学术演讲, 出版时增加了附录部分, 收有古今各种字体的汉字。文中指出了研究中国以及学习中国语言的重要性, 向听众和读者介绍了汉语和汉字的特点, 并着重分析了汉字的表意性和汉字的“六书”。对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以及中国文学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有许多见解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特约译出, 以飨读者。文章的题目与文中小标题均系译者所加。

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221-9056(2012)02-0210-10

一、引言

在目前情况下, 新公务员到任时要发表就职演说这一通行的惯例, 其重要性超乎寻常。原因是: 中文这一学科所取得的成就与其所受到的关注还不相称。中国距英国虽有万里之遥, 却是茶叶和丝绸的原产地, 而茶叶更是全球性的消费品, 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现在英国人所进行的研究遍及各个领域, 而加大对中国的研究力度也就变得理所当然。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人类智力的发展。诚如《圣经》所言, “必有多人来往奔跑”,^③知识正以惊人的速度飞快增长。这不仅发生在一个国家, 几乎每个国家都在发生, 而以英国的发展最为惊人。先知描述古代推罗^④的话也可以用来形容英国: “她的商家是王子, 她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⑤

英国的航运遍及各国, 英语的声音也传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海外贸易逐年迅猛发展, 国内的科学和艺术也相应繁荣。如今人类智力所及的每个知识领域都得到高度关注, 其中基础数学和古

收稿日期: 2011-11-08

作者简介: 詹姆斯·萨默斯(James Summers, 1828-1891, 又译苏谟斯), 英国肯特郡人, 19世纪英国语言学家、汉学家、教育家, 1848年任教于香港圣保罗学院, 1852年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语言教授, 代表作为《汉语手册》(A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63)。

译者简介: 于海阔, 男, 吉林双辽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方环海, 男, 江苏沭阳人, 文学博士,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8—19世纪西方汉学与汉语词类研究”(2012B149); 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专项项目。

• 210 •

典文学,作为培养逻辑推理和高雅品味的基础,受到高度重视,科学和文学作为一般常识也一样。不过,科学研究中没有哪个学科像语文学(Philology)特别是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那样受到如此关注。

二、人类语言的整体特征

关于这门学科,我想先就人类语言的总体情况谈一谈,目的是今后如碰到汉语所独有的特征,可以根据其起源和演变与其他语言进行有效的比照。

语言是人类通过声音和符号表达思想的工具,声音和符号分别与耳朵和眼睛有关。毫无疑问,语言原本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上帝塑造了人的头脑,不但赋予了人类思考的能力,而且也赋予发音器官以表达思想的能力^⑥。不仅如此,对人类表达内在思想而言,语言更是必不可少。

从婴儿呀呀学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每天都在努力学习语言。过了婴儿期以后,人因而有了表达能力。然而,开始时婴儿的语言学习也只是粗糙和有限的。随着大脑发育的逐渐成熟,小孩慢慢学会使用语言向他人表达思想。因此,人类早期的语言,起初不过是对自然界事物简单粗浅的命名,后来随着人类的智力发展,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进行思想交流,对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独立的和关联的对象都表达得淋漓尽致,至此语言发展到了近乎完美的阶段。

尽管语言与人的思想同步发展,然而这种发展在不同国家、不同年龄段却不尽相同。作为语言发展的途径和载体,人的思想和人际交往状况也随着一个国家不断的历史演变而发生相应变化。每个家庭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交往对每种语言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特别的影响。我们从《圣经》中得知,上帝因建造巴别塔(即通天塔)的人类狂妄自大,于是就变乱了他们的语言,这也是地球上的人说不同语言的根本原因。这些建造者们的工作只能半途而废,于是本来说一样语言的人分别组成许多小群体,各自离去。

世界上现在所见到的数量繁多的各种语言,大概就是来源于此,它们对不同国家间的自由交流构成了严重的障碍。在某些语言中(如果不是全部语言的话),甚至有可能找到原始语言的痕迹,每种语言在其鼎盛时期都有支持者,坚称这种语言最为原始。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在我个人看来,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Philology)的发展足以证明这些语言具有同一来源,而这种语言的基本知识要么已经缺失,要么由于时间推移其形式和发展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如今无踪可觅。

整体说来,如果不考虑其方言形式,根据汉语的单音节特征就可以证明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并且从它形成之日起这门语言的变化就很小。

最简单和最早的语言形式显然是单音节词,因为大多数语言的词根都是单音节的。实际上,有些语言的词根形式虽然一直包含几个音节,但现在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认为它们只包含一个音节。^⑦以希伯来语为例,在当代一些语言学者的努力下,这门古老的语言已经焕发出新的活力,其原始特征则变得更为凸显。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语言将不同性质的语词结合在一起,例如通过添加原本具有实义的介词等方式,这些语言的单音节特征似乎也因此发生改变,但这种音节与音节的粘合过程并非在每种语言中都会遵循同样的顺序,或都能达到希腊语和拉丁语中音节粘合的那种程度。

在中国的通用书面语中,几乎任何变化都没有发生。但在官话口语里,我们发现确有通过音节联合而形成复合词的情况,在各方言口语中这种现象就更多了。然而,由于缺少文人阶层的支持,语言中这些发展变化还处于粗糙状态,这可以同英国约克郡的乡下人使用的粗糙表达方式或宗教改革前英语的状态相提并论。

我们远祖的思维难以超越自然界及自然现象,因此在思想表达上一定是相当有限的。在他们

那里,抽象概念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因此表达抽象思想的词汇肯定也很缺乏。结果发现,每种语言中最古老的词汇都是一些客观事物以及自然现象的名称。随着人脑抽象思维的逐步发展,就越来越需要能够表达这些思想的词汇,类似婴儿呀呀学语时期那样的粗糙语句就会变得圆润起来,并富有韵律,一旦表达物体、动作与关系的词汇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双音节词和三音节词。

需求是人类发展的最大驱动力。随着文明的进步,各个国家的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立了适合于通过眼睛进行交流的文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正如我们所见,音节的合并与联合因其地域而异,其发展过程在各国也不尽相同。文字的发明和完善也并非在所有地方都发挥了相同的职能,各国不同的气候条件、政治制度和传统风俗等因素,综合在一起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字,并通过文字影响了各自的语言。在这方面,汉语显得尤为突出。

书面语言的最初形式不过是以图形方式表达思想而已,像埃及人、墨西哥人和北美印第安人,似乎都曾用这种艺术化形式来记录事件,而中国人和秘鲁人则使用“结绳记事”,其他国家发明了表示基本语音和音节的符号,继而又发明了“印度日尔曼语系”(Indo-Germanic)的字母表以及鞑靼语(Tartar)和多种日语方言的音节表。

象形文字一旦被发明就被固定下来,除了根据意义可将其细分成若干小类之外,一般就再也无法找到改进的空间。象形文字没有屈折变化,只允许对简单的基本符号进行缩减。每个符号代表一个单独的意义和一个简单语音,“单音节”就是象形文字身上的烙印。

三、汉语与汉字的特征

上面就人类语言的总体特征说了这么多,现在大家把注意力转到今天的主题上来。在某些方面,汉语同时具有象形性和单音节性两个特征。

今天我演讲的目的就是对中国语言和文学进行总体性的介绍,并请大家对此予以关注。假如这次演讲的主题是有关中国地理、历史、自然物产或者艺术品以及中国制造的产品的话,对本人来说似乎比较容易把握,各位也自然会更有兴趣。但是使用这门语言的民族是如此古老、如此特殊、如此排外,与我们西方世界的文明和教养相距又是如此遥远,因此汉语的难度不同寻常。考虑到这一点,可能会有些过度耗费诸位的耐心。我的意思是用威尔逊^⑧教授去年的一篇演讲^⑨中的话来表达就再恰当不过了,“纯粹文学性的话题,如东方世界的语言、文学、制度、信仰,几乎没法通过公众演讲来使之变得有趣。它们如果不被理解,自然也就难以让人感兴趣,在没人研究的地方也就无法被人理解,它们需要有知识基础才行。”这一说法十分正确。要想深入了解一门语言,见识它的美丽,感受本国人听到这些话题时所能得到的灵感,就有必要去接受本国人所接受的语言教育。

(一) 汉字的起源于汉语的形式特征

汉语在外形上具有象形文字的特征,语音上又具有单音节的特征。因此,可以从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首先,将其作为书面媒介;其次,将其作为语音形式。我没有说将其作为口语媒介,因为那样的话就要把众多的方言口语考虑进来,由于它们各自有其区别性的特征,我更愿将汉语单独进行论述。

首先,汉语的起源及原始形式是象形文字。中国文字的起源可追溯至远古时代,那时的一切黑暗而动荡。关于中国人文字的最初发明有许多传说,其真实性可以通过一些事实加以验证。现存的许多碑刻,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世纪,如果“大禹碑”是真品,其年代则更为久远。据说大洪水时期过后,不久仓颉就发明了这些文字符号。公元前1766年,商朝的开国之君“汤”在浴盆上刻下铭文^⑩,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早期证据。据说,古时有一位国王,受乌龟外壳上的奇斑异纹启发,发明了这些伟大的符号。还有人说鸟在沙滩上留下的爪痕给了造字者同样的灵感。如果考

虑到中国人对有关文字的神奇传说和极其荒谬的迷信说法,可能就会自然而然地去找其他众多有关文字起源的传奇故事。无论汉字的起源如何,它们在结构上都最具创造性,也最为独特。经过四千年的演变,汉字的原始外形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弯弯曲曲的古汉字实际上有若干种不同的字体,它们现在已被磨平了棱角。现代汉字形式优美,结构匀称。现代汉字的字体也有以下若干种:篆书(用于印章)、楷书(用于印刷书籍)、隶书(用于政府公文)、行书(用于手写)、草书(商人使用,并用于书写文学作品的序言)。

许多汉字虽然看上去很复杂,但它们却都是由几个简单的笔画构成的,最多不会超过八个。这八个笔画足以构成任何一个字,“永”和“衣”这两个字则包含了全部的八个笔画。这样,当学习者能把这些简单的笔画写好时,就已经掌握了中国书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为书写汉字打下良好的基础。下一步就是掌握每个汉字的比例,中国人对此非常重视。每个汉字都写成完美的方块字,为了让孩子学好书法,中国人会教他们在书写用字的底下垫上一张方格纸。我在此可以顺便提一下“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笔用貂、狐、猫等动物的毛制成,书写时采取垂直的姿势;纸的主要原料是竹纤维,适于书写汉字;墨的主要原料是油烟,做成墨锭,使用时加一点水在砚台上研磨;砚一般是一块质地非常坚硬的板岩或大理石,上面常刻着精美的图案。

(二) 汉语与汉字的意义特征

上面说了这么多汉字的外形和书写方式,现在来看看它的意义。

从某种角度上说,许多汉字完全是象形的,我的意思是说它们对要表示的实际物体进行图画式表达,有些汉字只是部分地代表了实际的物体,还有些字只是所要表达思想的象征性符号而已。

通过汉字的分类,对这一点可以理解得更加清楚,中国人他们自己把汉字分为六类:象形、会意、指事、转注、假借、形声。在这六类中,前五类只包含几百个字,而最后一类则包含二万字以上。把相当数量的汉字当作声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造出大量汉字,例如范尚人^①的《字声纲目》,其中有一个汉字(音 ting)充当声旁,就组成了约 20 个复合字。

汉语中,每个字都有单独而明确的意义,没有制定好的通用规则,就可以通过结构发现单个汉字的意思。若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字典的编排方案,根据少量基本字形进行分类,其他所有汉字都列于其下。中国人将这些基本字形称作“字部^②”(tsz-pu),外国人称之为“keys”或“radicals”。“部首”的数量大约在 500 个左右^③,但在清朝皇帝(尤其是康熙皇帝,在其统治时期命人编写了著名的《康熙字典》)的统治下,汉字部首得以改进,现已减少到 214 个。即使这样的数量其实也并不需要,比如澳门的公神甫^④编写的《汉葡字典》,就只用了 129 个部首。

部首是汉字中最明显、最突出的部分,它对整个字义产生影响,因为部首往往是由表示某一类事物的类属词(generic word) 充当。例如“山”作为部首,下面列有数目繁多的高山、丘陵、悬崖、岩石、峭壁以及岛屿的说法,另外还有表示抽象概念的方式,都取自于大自然中与之相似的外形特征;“玉”作为部首,下面列有各种宝石的名称,还有一些表示抽象意义的词用来形容珍贵的、闪光的、像宝石一样的东西。“马”作为部首,下面列有各种表示四足动物的词,尤其是与马具有相似特征的字。

这些部首一般是由最常见的表示物体和日常行为的字充当,这些字适合用于表示其他字的所属类别。在这 214 个部首下面,大约列有三万个不同的汉字,其中还不包括异体字;但是,在这些汉字中,有很多并不常用或已废弃不用。通行的字典中,汉字总量一般在一万左右,即便这样,一般性的阅读和写作也用不上这么多,八千个汉字就足够了。如果只是日常使用,数量甚至还可以再少更多。

在字典里查汉字,首先要知道这个字的部首,其次还要知道除部首外剩余部分的笔画数,例如:要查“唵”字,先要查“口”这个部首,剩余部分是 8 画,所以在字典里先找到部首“口”,再找哪些字

笔画是 8 画,找到该字意思“口急也^⑤”。

这些充当部首的汉字虽然多为象形文字,不过到了现在,更多的汉字已经都是形声字,也就是说,声旁只表示发音,不表示意义^⑥;形旁只表示笼统的意义。或许可以这样说,形声字的一部分表示声音,另一部分表示部分语源(etymology)。

这些形声字的形成原因,可能是口语中的某些语音有时没有合适的汉字可以表示,这时就选用其他的同音汉字加上相应的表示意义的部首,从而产生新字。

这些用于表音的字数量在 1040 个左右,它们同部首组合可再生成 10000 或 12000 个汉字。表音的字经常可充当部首:有时两个或三个部首组合起来,有时形式上较为随意。一般情况下,作为声旁的汉字在添加不同的部首后可组成一系列的形声字。

汉语的阅读顺序是从右到左,竖排版时阅读方式则是从上到下。中国人的图书封面恰好是我们的图书封底,他们的标题和页码在书页的一侧,注解和评论则在书页的上端。

每个汉字都由单音节表示,虽然两个或多个部首可以组合成新汉字,但读音上却只有一个音节;这并不是通过读音规则合并而成,而是任意进行合并。因此,确切来说,汉语的书面语具有单音节特征,因为每个汉字只代表一个单音节,这个音节可以表示明确意义。然而,如果我们注意与书面语截然不同的口语的话,就会发现经常有两个或多个音节结合起来表示一个意义,所以,汉语口语中的习惯用语也就带有多音节特征。对这一点,可以通过中国境内的多种方言看得更加清楚。我们现在只考察汉语中北京话或南京话的发音,后者则是这个国家的初始语言^⑦。每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这个音节几乎都以元音结尾。音节不以元音结尾时,就是以鼻音 n 或 ng 结尾的。通用语中总共有 400 多个音节,结合不同的声调和送气方式,可能至少有五种变体,这样音节总数就很大了。然而,这些音节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成对使用,意义上都不清晰,容易产生歧义。于是我们发现:一篇措辞简约的文章,即使让本国人以正确的语音来读,如果不看汉字的话,另外一名中国人往往也未必能够完全理解。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为了清楚地表达思想,中国人在说话时往往会把意义相同的词合在一起,使其在意义上进行强化与限制。另外,中国人还使用大量的词缀和量词,通过这些词,可以使表达的意思更加明确。

(三) 汉语与汉字的语音特征

有些仅在欧洲学过汉语的人大概会问:罗马字母^⑧能否用于汉语书面语?从以上的论述中很容易得出答案:这是没用的。因为汉语书面语光是被“听到”是不能被理解的,汉字必须被“看到”才行。然而,这仅仅是针对书面语而言,汉语口语媒介则要丰富得多,像欧洲的语言一样富有表现力,容易理解。如果用罗马字母书写,汉语口语就会像我们英语一样容易阅读。但是,要用统一的表音系统来描写所有的汉语方言,并得到中国不同地区的所有传教士及其他人士的赞同与合作,又是非常困难的。我本人采用的这套表音系统,经过屡次试验,最近,根据英国海外传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亨利·维恩^⑨牧师的建议,我对之进行了修改,似乎更适于在中国广泛使用。其中,元音系统得到了欧洲大陆许多学者们的认可,辅音则受到了以传播东方文学著称的波普·弗朗兹^⑩等作家的充分肯定。

以往中国人采用的是反切注音法,即把第一个汉字(反切上字)的声母和第二个汉字(反切下字)的韵母拼在一起,为其他汉字进行注音。这套方法是由佛教徒从印度传入中国和日本的。例如“ling”这一音节中国人将其注音为“李(li)”和“精(king)”,即反切上字“李”的声母“l”和反切下字“精”的韵母“ing”,这样就形成了“ling”这一音节。使用汉字为汉字注音,这套方案是不错的。但使用罗马字母会更好一些,如果中国人都能采用欧洲的字母系统为汉字注音,就会往前迈了一大步。然而,用普通的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肯定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于其他一些符号来表示每个音节的特殊声调。

这里可能需要特别注意汉语的“声调”。进行汉语研究的外国人将声音的抑扬顿挫称为“声调”(tones),这似乎已经成为汉语学习者的一个巨大障碍。有些汉语通用语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学习者,甚至曾建议汉语声调可以忽略不计²¹。有些汉语学习者,在学习之初因不重视声调学习以致发音以致没学好,他们建议声调学习应该成为汉语学习者的第一要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汉语口语更加准确清晰。²²声调不仅仅在诗歌创作中有要求,而且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每个字和词都是有独特声调的,这不只是由具体情境下的个人特殊情感表达所导致,在所有情况下声调都依附于汉字之上。因此,在同中国人交流时,外国人要想有很好的表现,就必须学好声调。

由于部首可以视为书面的汉字的要素,那么声调也可以看成是口语中音节的主要成分。

在中国人编的字典里,汉字可以根据部首进行分类,而声调也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特别是在韵书中更是如此,韵书中将所有音节按不同声调和韵律进行编排,例如:sīn, tīn, līn, sìn, tìn, lìn, tīng, líng, mīng等等²³。

一般来说,汉语有八个声调,然而在不同的方言中,声调总数并不相同。南京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方言有八个声调,福建方言有七个声调,上海方言也有八个声调。根据说话时的音高,这八个声调可分为高和低两个系列,两个系列各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这些声调可在每个音节的元音上方用下列符号标出:“一、\、/、√、^、\、·、·/、√”²⁴。对前五个声调符号,来中国的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Jesuit)²⁵也曾使用过。

下面讨论的五个声调属于南京话(Nankin dialect)或者叫官话(court dialect),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它作为一种从政能力,不仅是官员们在官场中的交际语言,甚至普及到整个中国。

第一个声调叫做“平声”,因为声音似乎保持在同一水平上,音高没有变化,用一条横线表示非常合适;

第二个声调叫做“上声”,因为发音时声调上扬,故得此名;

第三个声调叫做“去声”,因为声音下沉,并逐渐减弱;

第四个声调叫做“入声”,因为刚一发声,声音就突然停止;

第五个声调叫做“下平声”,同第一个声调(上平声)类似,音高没有变化;

这些声调可能看上去无关紧要,但事实上它们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证明,下面列出一些同音不同调的字加以对比:

旗 基 其 气²⁶;

记 己 起;

亡 忘 妄 惶;

方 访 放 房;

化 花;

分 粉 忿 吩。

(四) 汉语的词类与句法特点

汉语除了字形和发音独特以外,它的词汇和句子结构也非常特殊。每个音节虽然都有一个单独的意义,但除用在文言文中之外,很少单独使用。

动词性复合词中有很多是由意义相关的两个字联合构成的,例如:看见,行为,搂抱。

名词结构中,有一类词用于充当词缀,例如“凶手”的“手”、“马夫”的“夫”、“木匠”的“匠”、“学者”的“者”等。

汉语中还有一类词叫做量词,数量很大,同英语中下列说法类似:a herd, a flock, a bundle, a pair, a suit, a set;中国人用这些量词时十分精确,如果误用的话听上去会显得很荒谬,就像讲英语的人听到“a flock of soldiers, a company of horses, a troop of sheep”这些奇怪用法时感到很可笑一

样。然而,汉语中这类词的使用比其他语言中更为广泛,每个名词都有其特有的量词。例如:中国人不说“一轿子”,而是说“一乘轿子”。正确地使用这类词非常重要,学习者需要研习多年才能达到准确掌握的程度。

汉语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用数词来表示整体或多样性,例如:

百官: 所有官员;

五行: 金、木、水、火、土;

五伦: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

万德: 每一种品德;

万代: 永远;

四海、九洲: 全世界;

五爵: 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

汉语里,词汇虽然没有屈折形式,但可以通过变调来改变意义,将名词变成动词,或将动词变成名词。另外,词的性质和类别不是由其原始意义决定,而是由它在句中位置所决定的。

中国人自己制定了许多语言规则,他们称为“文法”。通过“文法”,他们把汉语词汇分成“实字”(即实词)和“虚字”(即虚词)。前者再细分为“死词”(即名词)和“活词”(即动词)。后者包括前置虚词和后置虚词(initial and final particles)、感叹词、起连接和过渡作用的虚词。在中国人看来,正确使用这些虚词非常重要,也最难达到,正确掌握虚词则是修养和学识高的一种标志。

汉语语法的基本规则非常简单和自然。如果成分齐全,汉语中的句子就按下列顺序进行排列:主语+谓语动词+直接补语(complement direct)和间接补语(complement indirect)。修饰成分放在被修饰词的前面,例如:形容词放在名词前面,副词放在动词前面,等等。如果句子隐含了主语,说明主语是人称代词。如果句子没有动词项,说明动词是存在动词(substantive-verb),或者其他词代替动词使用。如果几个名词并列出现,要么它们组成词组,要么是在列举,要么它们是同义词进行互相解释和限制。因此,汉语的句子形式学习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困难,但是虚词却必须经过长期练习才能达到正确使用的程度。

(五) 中国的通用语问题

经常有人说:中国的语言是统一的,从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可以承认这种统一性的存在。这话确有几分道理,但也有很大的局限。虽然欧洲国家都使用同样的书面文字,这些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都懂拉丁语,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欧洲国家只有一种语言。中国的领土面积同欧洲差不多一样大,但由于道路交通落后,偏远省份甚至一些邻近省份之间的交流非常少,结果导致各省之间就像不同的国家一样相互隔绝。因此,中国缺少使口语产生相似性的条件。于是,我们研究发现,在文学领域,虽然各地学者使用一种大家都能理解的独特文字,但每个省份还有自己独特的方言,同相邻省份所讲的方言着或多或少的差别。

除了通用的书面语使用一种文字形式之外,还有一种政府官员说的通用口语,在官府衙门里使用。过去整个欧洲曾经把法语作为上流社会的语言,二者情况显得很相似。

这种通用的口语媒介有两个变体:一个是北京官话,中国最北部的人说的话;另一个是南京官话,在整个中部和南部地区使用。然而,中国目前仍处于准文明状态,拥有较高社会地位或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我们必须接近大众,去听他们说的话。

在中部和西部省份我们听到的语音同我们在北京听到的很不一样。如果我们到了南方的广州,就会发现那里的语音更是完全不同。在北方我们可以听到:元音 i(ee), ai(ah-ee), ei(ay-ee), iü(i-eu), au(ah-oo), 以及 church 中的 ch 和 loch 中的 ch 等清辅音都发得很清晰。中部省份的典型发音是: e(ay), o(aw), u(oo), 以及鼻音化最严重的元音,如 k 'aⁿ siⁿ 等。在南方则可以听到更

为开放的元音,如 oi, iu, ui(oo-ee)等,辅音发得很清晰。

这些方言在某些方面同官话很相似,不过,如果同只懂官话的人谈话,这些方言特征,却完全不被理解。它们有共同的历史来源,可以使用同样的书面文字来表达口语中的土话;但很少有人这样做,因为用汉字来书写口语被认为是庸俗的。实际上,对有些方言来说,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些口语的音节在书面语中根本找不到相应的汉字,例如口语词(euphonics)、语助词(expletives)或某些事物的通俗名称等等,这些在汉语中都另有正规的说法。虽然有些中国人书写汉字能够流利自如,然而对于大多数会写字的人来说,这仍是繁难的一件苦差事。

三、中国的典籍及其他

关于中国文学,可能需要单独再进行一次讲座,这个主题范围很广,内容也会很有特色。然而,在今天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必须努力为在座各位概括性地描述一下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中国文学最为繁荣的各个时期。

毫无疑问,中国文学是东方世界最丰富、最广博的文学。两千多年来,中国作家辈出,他们的著作至今尚在,有的得以全部保存下来,有的则是部分流传。然而,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评论却非易事,因为需要掌握更多这方面的知识,而且还要超过现今任何外国人所能达到的程度才行。

在中国,著书和售书不仅可以带来利润,又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在大众心目中,对本国文字的尊敬容易促进图书销售。

现在有很多种图书目录,我们随便拿起一份就可发现:中国的书籍范围十分广泛,并且数量繁多。最好的图书目录是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它包括 112 卷^{②7}(12 开本),每卷 140—150 页。这部四库全书包括经、史、子、集四个部分。

其中,第一类为“经”类。

《易经》是由孔子编纂的,它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上面有近 1500 条评论和注解。它论述了伏羲所传授的哲学,有人说伏羲同诺亚这位始祖大致处于同一个时代。这本书的目的是对伏羲的神秘图形以及万物之源进行解释。但是,对欧洲人甚至中国本国的学者来说,它简直就像天书一样难懂。《易经》的主题是“八卦图”,这也是全书的核心所在。该书已由莫耳(Mohl.)^{②8}博士翻译成拉丁文。

第二部著作是《书经》(尚书),它包含许多汉语中最优美的道德箴言,该书据说是由孔子编纂的,他整理了当时最古老的史料,叙述了从公元前 2357 年(尧统治时期)一直到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孔子同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公元前 600 ~ 前 529)处于同一时代。上海的麦都思^{②9}博士已经将这部作品成功地进行了翻译。

《诗经》这部作品据说也是孔子编纂的,他选取了最古老的诗歌,将其按年代顺序进行排列。这些诗歌风格纯朴,但不易理解。该作品的拉丁文译本已由莫耳(Mohl.)博士在德国斯图加特(Stuttgart)出版。

《礼记》是孔子所编写的一部有关中国礼仪和习俗的资料汇编。这部作品受到中国人的推崇,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礼仪和规章制度的形成。

《春秋》的作者也是孔子,该书记录了他本人所处时代的情况。

第一类书籍中,其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书》^{③0},作者是孔子及其弟子,论述的是他的政治主张、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书中包含训诫的话语、先哲的美德以及以对话体语录,展现了哲学家的智慧,关于这些书已有大量的评论。读书人要想做官,就必须将这些书熟记成诵。这一类中书籍还有许多劝诫人们奉行孝道,并履行前面提过的“五伦”中的职责。

第二类书籍为“史”类。这类书籍的范围十分广泛,为未来的中国史学家提供了巨大的信息资源。历史类的优秀著作大约在 120 卷到 130 卷左右,时间跨度从公元前 2000 年的伏羲时代,到公元 1647 年明朝结束。中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是司马迁和司马光。除了叙述本国历史事件之外,中国人在历史上就几乎没有什么著述了。

第三类书籍为“子”类。这一类为专业的书籍,包括军事、法律、农业、医学、解剖学、数学等科目。艺术类的书籍也有一些,但是中国人在绘画艺术和音乐学方面的研究从未建立在正确的原则之上,他们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经验获得的。这一类中也包括通俗文学作品,它们题材广泛,如古代爱情小说、神话故事、传奇等等,还有几部是有关神话和佛教的著作。

字典和百科全书也属于这一类。最好的字典当数康熙皇帝命人编写的《康熙字典》,共 32 卷,康熙皇帝是公元 1662 年即位的。^①

《佩文韵府》是中国官修的大型词语典故辞典,大约有 120 或 130 卷,是中国的一个语言资源宝库。

第四类为“集”类,包括诗词及其他可以归为高雅文学一类作品。中国最有名的诗人是唐朝的李太白和宋朝的苏东坡。

中国文学最为繁荣的时期是公元前 8 世纪至公元前 7 世纪以及公元 4—7 世纪。鞑靼(Tartar)统治者似乎并不认同汉人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刚才对中国文学简要地进行了评论,下面我简要总结一下,并郑重地请在座诸位对有关中国语言和对中国人的研究进行思考。英国应该为中国提供巨大的援助,使其摆脱目前的孤立地位和未开化的蒙昧状态,——我指的是通过阻止其实行排外政策,以及在其人民中传播基督教的办法。真理的光茫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微微地闪现,而这种光茫却只是由少数人发出的。耶稣会传教士(Jesuit)^②是首批来华的传教士,他们专心勤勉,首先掌握了中国的语言,又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科学和宗教著作翻译成汉语。因此,我们必须接触中国人熟悉的领域,以各种形式向他们宣扬真理。这不仅能够使他们的精神得到提升,更能使他们超越平凡,走向永恒。

注释:

①译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由英国国王乔治四世和惠灵顿公爵于 1829 年创建,是一所传统的英格兰教会管理的大学学院,也是伦敦大学最古老、最大的学院之一。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是当时英国国内唯一一所教授汉语的学院,由于伦敦大学一直采用特殊的管理制度,国王学院英文名称至今仍使用 King's College, London,但该学院的毕业生均属于伦敦大学毕业生。

②James Summers, *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ondon: John W. Parker & Son, West Strand. 1853.

③译注:出自《圣经·旧约全书》:《但以理书》第 12 章。

④译注:推罗(Tyre),又译“提尔”,古代腓尼基城市,位于今天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南。

⑤译注:出自《圣经·旧约全书》:《以赛亚书》第 23 章。

⑥这种将语言的起源归于上帝的说法是西方的传统,即便站在今天科学研究的角度看,语言起源的问题仍然是非常棘手而且难以有定论的问题,所以十九世纪后国际学术界探讨语言起源的热度锐减,一些期刊也不再接受探讨语言起源的论文。中国学术界的教科书认为是“劳动”创造了语言,创造了语言产生的生理与心理条件。

⑦参见 Stiers' "Hebräische Sprachlehre," and Gesenius.

⑧译注:贺拉斯·海曼·威尔逊(Horace Hayman Wilson, 1786 - 1860)英国东方学家、牛津大学梵文教授。

⑨译注:这里指的是 1852 年 1 月 24 日威尔逊在皇家亚洲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演讲,题目是《东方文学的发展现状》(*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ultiva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⑩译注:我国称之为“盆铭”,铭文内容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⑪译注:范尚人(Joseph Marie Callery, 1810 - 1862)也叫加略利,法国汉学家。

- ⑫译注: 此处原文为“字部”(tsz - pu), 现一般称为“部首”, 为方便读者本文以下均将“radical”译为“部首”。
- ⑬译注: 《说文解字》中第一次把汉字部首归为 540 个, 这一部首体系影响深远, 直到清代。
- ⑭译注: 公神甫(Joachim Alphonse Goncalves, 1780 - 1844), 也叫江沙维, 葡萄牙传教士。
- ⑮译注: 参见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 ⑯译注: 这里说的是声旁只表音, 形旁表意。不过, 汉字研究中也“有右文说”, 即声旁也有表意功能, 汉字的意义系统是由形旁与声旁共同组成的。
- ⑰译注: 这里的说法很有价值, 说明普通话并不以北京话为唯一的历史源头, 以往学术界讨论该问题时, 总是强调北京话的正统地位, 不过这一认识大多是从分析韵书入手的, 恐怕如果结合更多的文献, 尤其是结合西方汉学的研究文献, “北京话正统论”就未必一定符合历史事实。
- ⑱译注: 罗马字母(Roman alphabet), 也称为拉丁字母(Latin alphabet)。
- ⑲译注: 亨利·维恩(Henry Venn, 1796 - 1873), 英国传教士, 1841 年至 1873 年任英国海外传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名誉干事。
- ⑳译注: 波普·弗朗兹(Bopp Franz, 1791 - 1867), 德国语言学家, 代表作为《比较语法》(Comparative Grammar) 和《东方文学史》(Annals of Oriental Literature), 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
- ㉑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聘(Robert Thom) 就持此观点, 他认为声调只有在诗歌创作中才重要。
- ㉒参见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博士的 1841 年出版的《广东方言撮要》(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 ㉓译注: 作者在举例时, 原文中将这些音都转写为罗马字母。
- ㉔译注: 第八个声调的标法是在“V”中间加一实心圆点, 由于字符库的原因特作此说明。
- ㉕译注: 耶稣会传教士是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 成员的统称, 中国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等。耶稣会为天主教修会之一, 1534 年由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在巴黎创立。
- ㉖译注: 作者当时记录的是南京官话, 读音同现在的普通话有差异。
- ㉗译注: 此处作者有误, 《四库全书总目》总共应为 200 卷。
- ㉘译注: 此处作者有误, 莫耳应为出版者, 译者为法国传教士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 1663 - 1738), 拉丁文书名为《中国最古之书易经》(Y - king, antiquissimus Sinarum liber quem ex latina interpretatione)。1834 年和 1839 年由莫耳(Mohl.) 在德国分别出版第一册和第二册。此书得冯秉正之助, 并对汤尚贤的注解有所采纳。雷氏译本在西方《易经》翻译史上占重要地位, 著名英语《易经》翻译者理雅各曾说“这是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最有价值的译本”。
- ㉙译注: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 年 - 1857 年), 英国传教士, 自号墨海老人, 汉学家。
- ㉚译注: 《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统而称之。
- ㉛译注: 作者此处有误, 康熙即位时间应为 1661 年。
- ㉜译注: 耶稣会传教士是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 成员的统称, 中国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等。耶稣会为天主教修会之一, 1534 年由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在巴黎创立。